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第 12 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主办

俄罗斯
文学专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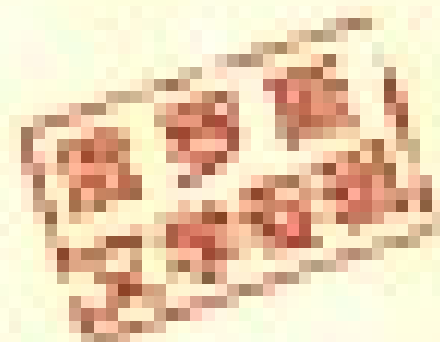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学出版社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12

EDITED BY
JAMES HEALING
AND
JILL LINDEN
Seri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ies NO.12

第12辑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年·成都

责任编辑：楼 晓

责任校对：张振刚

封面设计：晓 雨

责任印制：杨丽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文化与文论. 12, 俄罗斯文学专辑 / 曹顺庆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9

ISBN 7-5614-3227-5

I. 中... II. 刘... III. ①文化-研究-世界-文集②文学研究-俄罗斯-文集 IV. G1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4821 号

书名 中外文化与文论 (12)

主 编	曹顺庆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65 mm×240 mm
印 张	23.5
字 数	418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2 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 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 www.scupress.com.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文艺理论

1	二十世纪俄国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	张 冰
10	汉语“文化诗学”：在俄罗斯传统与美国学派之间	邱运华
23	文学理论的迁徙：俄国文论与中国建构的俄苏文论	林精华
33	文化研究：跨越“语言的囚笼”	夏忠宪
41	文学文本的心理语言学研究	易绵竹 何英玉
48	维果茨基《艺术心理学》的主要观点	赵秋野

十九世纪作家作品研究

55	论屠格涅夫《散文诗》的文体特征	朱宪生
64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谢春艳
71	掀开《穷人》的“外套”	柏 英
78	由辞象到抒情主人公	郑文东

二十世纪作家作品研究

84	从三种传记作品看苏俄高尔基研究	韦建国 李 红
94	梅列日科夫斯基：面对屠格涅夫的两副面孔	王立业
103	颠覆传统文学的另类文本	温玉霞
112	巧妙形式 丰富的内涵	胡世雄
121	俄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互文性特征	徐曼琳
132	论俄罗斯女作家娜塔利娅·托尔斯泰雅的创作特点	唐逸红
137	科幻小说？抑或预警小说？	王宏起
147	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创作的风格特征	陈 方

- | | | |
|-----|-----------------------|-----|
| 152 | 普罗汉诺夫创作中的车臣战争与东正教信仰 | 刘 涛 |
| 160 | 对叶赛宁和艾青诗歌创作的几点比较 | 万海松 |
| 174 | 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通信交往 | 李建刚 |
| 185 | 什梅廖夫小说题目的意义 | 戴卓萌 |
| 192 | 落寞的行者 | 池济敏 |
| 199 | 纳博科夫手下的“牌局” | 陈 戈 |
| 207 | 普拉东诺夫研究近况 (2000~2004) | 淡修安 |
| 218 | 拉斯普京小说《木房》主人公公开形象分析 | 杨 桦 |
| 226 | 幽细凄清 声情双绝 | 马卫红 |
| 234 | 《卑劣的小鬼》中萨沙与柳德米拉原型浅析 | 李志强 |
| 242 | 《日瓦戈医生》经典性初探 | 杨松芳 |
| 248 | 《切文古尔》阅读札记 | 邓鹏飞 |
| 255 | 拥抱死亡,为了那圣灵之国的降临 | 谢庆庆 |
| 262 | 悖论与悲剧反乌托邦小说《我们》研究 | 余自游 |

文化研究

- | | | |
|-----|----------------------------------|---------|
| 273 | 索洛维约夫的长诗《三次约会》中的永恒女性
即索非亚崇拜哲学 | 金亚娜 |
| 288 | 脱离“土壤”的“群魔” | 刘文飞 |
| 306 | 宗教文化札记两则 | 刘亚丁 |
| 312 | 鲜明的时代气息 浓郁的民族特色 | 祖淑珍 |
| 323 | 中俄传统文化交流在历史新语境下的延续 | 李逸津 吕 由 |
| 332 | 关于茨维塔耶娃的宗教意识 | 荣 洁 |
| 340 | 略论俄罗斯文学中的怜悯主题 | 刘 锟 |
| 346 | 从俄国的“安娜”到美国的“安娜” | 孔朝晖 |
| 351 | 沉重的肉身 | 张晓东 |

会议资料

- | | | |
|-----|-----------------------------|---------|
| 356 |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 2004 年年会的开幕辞 | 石南征 |
| 360 | 在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 2004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 杨继瑞 |
| 362 | 在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 2004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 石 坚 |
| 363 | 在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 2004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 曹顺庆 |
| 364 | 俄罗斯文学研究会 2004 年年会的闭幕辞 | 刘亚丁 |
| 366 | 文化视域下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新景观 | 水 木 邓鹏飞 |

20 世纪俄国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

张冰（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

俄罗斯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俄罗斯文学是一种最富于精神性的文学。哲学文学化和文学哲学化，是俄国文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19 世纪俄国文学和俄国解放运动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相互呼应，这是俄国 19 世纪文学走向辉煌的最根本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整个 19 世纪以普希金的名字为标志的俄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和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同样灿烂辉煌的文化高峰之一。19 世纪俄国经典文学，不仅是俄国，而且也是全世界全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之一，并且还将持久地对全人类发挥其影响。

俄国传统文化重精神甚于物质。古罗斯文化就以注重精神性而饮誉全球。俄国传统美学观，注重真善美的三位一体，注重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形成了一种俄国文化的民族基因。19 世纪俄国文学以注重精神道德探索而著称于世。探讨人的内涵、俄国向何处去，是俄国文化和文学中一以贯之的重大主题。“谁之罪”、“小人物”、“忏悔的贵族”等俄国文学特有的主题，曾经激励并且仍在深深地激励着全人类思考。19 世纪经典文学这一宝贵的人类精神营养，也是经济落后的俄国人对抗西欧资本主义前景的精神道德资源。19 世纪俄国文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和文学批评的蓬勃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和文学批评，是推动审美文化健康发展的两个车轮，它们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文学要想发展，离不开对文学自身的主体性反思，而文学批评就承担着反思文学自身的重要任务。紧密结合俄国解放运动促使俄国文学批评在 19 世纪繁荣昌盛，而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双向互动，是俄国 19 世纪文学的精神品位得以不断提升的一个很重要因素。19 世纪俄国文学是一种为人生的艺术，而文学批评实际上在始终保

证俄国 19 世纪主流文学沿着与解放运动紧密结合的人民性、民主性道路健康发展。19 世纪俄国文学史上涌现出一大批在世界文艺学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大批评家、大思想家,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在文学理论、文艺批评领域成为俄国精神文化的代表人物。和俄国文学史上“自然派”、民粹派等流派同样著名的文艺批评流派如西欧派、斯拉夫派、土壤派等,也是 19 世纪俄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意义在当今天国知识界普遍致力于在全球化语境从本土文化资源中寻求精神支柱的民族主义潮流中,正在慢慢地浮出水面,而与今天思考着的俄国人产生持久的对话。

20 世纪俄罗斯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俄罗斯文化也经历了并正在经历着一个艰难的转型期。从彼得大帝开始的俄国西化即现代化之路,已经走过了三百年的路程,走到了今天这个危机与复兴、传统与革新矛盾交织的时代。十月革命这一改变全人类历史命运的震惊全球的巨大事件,以给人类以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永载史册,而苏联解体,则同样给全人类以巨大的震惊。失去苏联这一重要的政治砝码后,俄国这架天平开始倾斜、失衡,俄国向何处去,成为全体俄罗斯人心头的焦虑。今天,俄国在经历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的短暂“新西方化”的困惑以后,迎来了普京时代,俄国人开始注重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中汲取创新的根基,曾经在民族身份认同方面有过的焦虑,正在被自信和骄傲取代。前不久,普京针对文化界持续达数百年之久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发言,明确表示俄国属于欧洲,力图为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论划上一个句号。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在考察俄国文艺学与俄国中小学语文教学这一问题时,应予首先把握的文化背景,也是我们据以对整个 20 世纪俄国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进行科学研究和分期论述的主要依据。以上所述的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都不能不在整体上,对整个文化,其中包括文艺学和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关系,发生深刻和巨大的影响。文艺学作为审美文化形态之一,它在文艺理论、艺术哲学、美学和文学批评、文学史等方面的嬗变,都会有机地渗透到中小学语文教学与研究的方方面面中来;反过来,中小学语文教学中时时产生的问题,也会对文艺学的整体发展,产生促进和推动作用,从而形成双向互动发展的格局。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整个 20 世纪的历史过程中,受政治影响(而苏联文化受政治影响最大),文艺学领域屡屡发生的重大变化,都对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整个过程产生了影响,并从根本上决定着它的方方面面。追溯这些变化对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影响,并从中发掘对于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便成为本文叙述的主干线索。

俄国精神文化的发达,和俄罗斯人文精神的传统教育有着密切联系。早

在 19 世纪,遍及俄国的古典文科中学,就素以注重人文精神教育而著称。俄国大学体制中,曾经长期不分具体学科,而是以把大夏科即文学、历史、哲学统在一起的“语文学”教育为文科教学的主要特点。而在中学教育中,文学和人文教育在整个教学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列宁就曾在此类古典文科中学就读,如列宁所述,他在中学时代除希腊、拉丁文外,还须学习英、法、德、西班牙文。俄罗斯人自诩为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合法传人,认为俄罗斯文化经由拜占庭而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真传。欧洲只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经由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发掘而使得人文精神得以发扬光大。西罗马衰落后,东罗马即拜占庭帝国在此之后还存在了一千多年之久,就是经由它们,经由保加利亚,俄国人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从而为本民族文化奠定了基础。俄国历来注重古典人文教育的另一个例证,就是普希金曾经就学的皇村中学。由于出了普希金,皇村中学已经成为俄国精神文化的象征。普希金是皇村中学开办以来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之所以能成为俄罗斯精神的象征、俄国文学的奠基人、俄国文学之父,除了他的天才以外,皇村等古典中学注重人文教育的传统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1812 年俄法战争前后的皇村中学,乃是孕育俄罗斯民族主义精神的摇篮。作为俄国典范的古典文科中学之一,皇村中学继普希金之后,先后还涌现出好几代俄国著名诗人如和普希金同时代的杰尔维格、丘赫尔柏凯等十二月党人诗人,和世纪之交白银时代著名诗人安年斯基、古米廖夫、安·阿赫玛托娃等人。正因为如此,在俄国,直到今天,皇村中学都享有“诗人的摇篮”的美称,成为俄国诗坛的圣地,受到人们的瞻仰。在俄国直到今天民间都流传着“到了皇村,不是诗人,也成诗人”的说法。皇村已经成为俄罗斯人进行人文精神教育的圣地之一。

俄国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关系,在整个 20 世纪,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景观。苏联的建立及其在世纪末的解体,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方方面面。从文艺学审视中小学语文教学,离不开连文艺学本身也寄居其中的整个文化。20 世纪,政治与宗教文化这两个重大因素,成为最值得关注的影响要素。

众所周知,语文教学和其他教学活动一样,事实上不可能摆脱文化,其中主要是政治文化的影响而独立生存,而在俄苏就更其如此。20 世纪,中小学语文教学就是在政治文化的大环境下生存和演变的,政治每日每时都在对一切文化领域施加它无所不在的影响,把一切文化领域置于其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下。这一点在苏联时期表现得最明显,在一种泛政治化背景之下,文化的各个方面都首先取决和受制于政治,都把自己的阐释权首先交给政治实施。

即使是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苏联意识形态在俄国解体之后,也还是新的政治文化在指导着包括语文教学这样的文化部门的运行。因此,我们在进行俄国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关系研究时,政治乃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视角,只有在这样的观念把握之下,我们才能发现一个时期中,究竟是怎样一种政治文化在支配着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及其角度的。

对俄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影响最大的第二个因素,是宗教文化。毋庸讳言,宗教文化在苏联时期,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苏联在其建立初期,就大力提倡无神论、大力取缔教会、大规模拆毁教堂。在70多年的苏联历史中,东正教文化从官方文化中消失了,宗教信仰从庙堂走向民间,成为知识分子的内心需求和老百姓的民间信仰。这种做法无疑是一种偏激。事实证明,宗教信仰是一切行政干预所无法予以彻底清除的。果不其然,苏联解体之前,包括东正教在内的宗教信仰就卷土重来,短短几年就开始全面复辟。到今天,宗教已经成为俄国文化中最活跃的要素,以致离开宗教角度,我们终将无法彻底理解俄国文化的全部精髓。宗教文化的复归只是使俄国文化复归于其固有的传统,因为早在十月革命前,东正教、专制政体和民族性,就已被沙皇时期的大臣乌瓦罗夫宣称为俄国文化的三个基点。这一定性尽管出自沙皇御用文人之口,但这丝毫也不能抵消它所包含的真理性,我们不能因人而废言,对前人的告诫不闻不问、不予理睬。

十月革命作为全人类历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对于俄苏乃至整个世界历史,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在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领域,十月革命同样是一个分界线,把新旧两种文化分隔了开来,成为指导我们进行历史分期的重要依据。在整个19世纪,随着民主解放运动的日益进展,受民主自由潮流的裹挟,中小学语文教学也发生过一系列显著变化。同样也是迫于时代的压力,历届沙皇被迫做过一些改革,如取消对平民子弟入学的限制,允许出身平民的子弟从政等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中小学教学更是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首先,尼古拉二世被迫取消了对舆论的钳制,致使社会思想更趋活跃,一场轰轰烈烈,就其意义丝毫不亚于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种大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俄国实行了文字改革,现今我们所用的现代俄语书写体,就是在这时拟定并实行的。这个时期俄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呈现出一派繁荣和衰落并存的奇妙景观。参加这次文艺复兴运动的主体——知识分子,起到了呼风唤雨、引领时代浪潮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时期,俄国产生了自己的、真正足以自豪的宗教哲学思想,艺术和文学等也都达到世界水平。俄国知识分子怀着末日论

思想情绪和弥赛亚热情，想要为迷途中的俄国人民找出一条出路。文坛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各领风骚，现代主义受西欧影响逐渐成为引领时代风尚的文艺大潮，给整个白银时代文化以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俄国固有的学院派文艺学也在此期间达到其辉煌的顶点，以维谢洛夫斯基为代表的历史诗学和以波捷勃尼亚为代表的文艺心理学派，都是俄国传统学院派文艺学的宝贵遗产，对于后来苏联的比较文学、文艺心理学流派、俄国形式主义等有很大影响。以象征主义开场，阿克梅派和未来派继其之后的俄国现代派，也为世界文学贡献了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建树则对于整个20世纪世界文艺学产生了无比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俄国现代主义以前备受冷落，但其在文艺美学、文艺学等诸多方面的建树，随着时间的迁移其意义日益显著，对这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当予以重视，并找出它与俄国传统的斯拉夫派、与18世纪文学和俄国传统民间艺术之间的承传关系，揭示其对于今天的意义。20世纪20年代文坛和文艺学领域里贯穿着无产阶级文化派与其他所谓“同路人”、现代主义哲学美学之间的斗争，而呈现出多元共存、百家争鸣的景观。整个20世纪20年代文坛上团体林立，流派纷呈，众声喧哗，多元并存。这种宏大景观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渐渐被废黜百家，独尊一家取代，无产阶级文化派逐渐成为文坛主流，到1934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时，整个20世纪20年代文坛百家争鸣的局面已完全被一花独放所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唯一的、居主导地位的官方流派。

苏联在整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作为苏联曾经有过，并对世界文学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一个主潮流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其辉煌的成就，她以其对于爱国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张扬，极大地推动了苏联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一大批富有理想主义光辉的好作品，但也有一些以歌功颂德、美化现实为特点的作品，以及对现实的粉饰倾向而减低了它们的艺术价值。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分析应当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不应跟风似的一概予以否认。由于受庸俗社会学影响，在此期间的文学也不乏一味美化现实，鼓吹无冲突论的作品。文艺理论也概念单一，失去了文艺本身的特点，单纯的政治观点占了上风。

苏联在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继位后接踵而来的“解冻时期”，是苏联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重要的改革时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被解魅后，思想文化界迎来了空前的解放。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政府提出了“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等人道主义口号。文学开始了回归人本身、回归人道主义本身的进程。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爱伦堡的《解冻》等作品的

发表,被誉为“报春的燕子”。俄国诗歌也迎来了她有史以来的第三次高潮(前两次分别为19世纪初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诗歌及文化的“白银时代”)。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解放,把人道主义提升到时代精神的高度,使得文坛出现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高潮。解冻时期后期有收缩迹象,但在那一时期中孕育的成果,在许多年后仍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艺学界,后来给予世界文艺学界以很大影响的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即以尤·洛特曼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文化学学派,开始随着春风起舞。国际上,一个此前默默无闻、僻处苏联一隅以教书为生的20世纪大思想家、大文艺理论家米·巴赫金,开始被西方人发现,其声誉日渐增长。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苏联先后经历了两代领导,即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此二人在政治上少有建树,历史上被看做是以“守成”为特点。在他们领导下的苏联,官僚主义愈益严重。一般把这段时期称为“停滞”时期。但如今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即所谓“保守”也有其好处,那就是可以有效避免社会的剧烈动荡。有人认为这个时期的苏联是苏联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富裕。所以,所谓“停滞”云云,尚待商榷。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苏联政局出现不稳定征象。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透明度和公开性,使得反思苏俄历史、翻历史旧案、否定苏共领导、揭露历史黑暗内幕成为普遍流行的风气。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意识形态的解构动摇了苏联的国本。非意识形态化或反意识形态化甚嚣尘上,否定苏共领导、否定苏联意识形态渐成气候。是戈尔巴乔夫揭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宗教文化和宗教意识形态适时兴起,以填补人们的信仰真空。苏联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机制呈现岌岌可危之势。地方民族主义、地方自治倾向开始抬头。长期以来未得到很好解决的民族问题,开始在苏联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引发骚乱。在此时期,无论愿意与否,处于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的政治文化开始松动。文艺学界思想更进一步活跃,随着巴赫金在苏联的走红,人们开始认真反思苏联时期文艺学的贫乏和术语的单一化,感到迫切需要“新话语”体系的引入,同时也更加迫切地感到有必要从祖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使文艺学得以创新的思想文化资源,以便打破僵化生硬的旧的苏联式的文艺学模式。

20世纪90年代至今,苏俄经历了过去长达百年未曾有过的激烈动荡,苏联的解体实际上并未一次性的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相反,问题不但存在,反而愈演愈烈。俄罗斯人凡事爱走极端、“否定一切,哪怕一无所有”的民族心理在种种问题上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对待前苏联的问题上更是如此:他们为了倒洗澡水,不惜连孩子一并倒掉。叶利钦的上台就是顺应了这一趋势的结果,而叶利钦也就成为俄国当今全盘西化的领袖人物。在叶利钦领导

时期，俄国各文化领域都出现了全面西化之势。俄国人所谓“自上而下”的改革本身，不但主意来自美国人，就连启动经费也仰赖美国的支持。在文化领域，全球化表现为全面西化或全面美国化，呈现出一边倒之势。私有化证券改革致使经济莫知所从，旧的破坏掉了，新的尚未建立。工厂倒闭，企业瘫痪，卢布贬值势不可挡，广大人民沦入生活无着的境地。西方式的通俗文化泛滥，色情、暴力文学铺天盖地，纯文学却举步维艰、难以生存。文艺学领域也经历了同样的西化危机：西方文艺学术语潮水般涌入，以致如果不学一点西方式术语，文艺学家便犹如患了“失语症”，无从发言，失去了话语权。英语全面渗入俄语，掺杂英语或直接用俄语拼写的英语单词泛滥成灾，以致于你如果不懂得英语也就听不懂看不懂俄语，使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知识分子忧心忡忡。社会上出现了每一个极权专制政权倒台后必然相继出现的信仰危机、道德真空和意识形态真空状态。思想混乱，道德沦丧，价值真空，意识形态真空，多元共存实为可作为建国、立国之本的精神支柱的缺席所引发的必然结果。

事情在普京上台后有所改观。普京力求全面扭转全盘西化的趋势，力求重建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主义主体地位和民族身份认同。这在他上台后出台的一系列对内对外政策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普京领导下的俄国政府以法律条例的形式保护俄语的纯洁性，把保护俄语的纯洁性提高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并为此举办了多次高层研讨会。随着民族主义精神的上升，俄国开始在文化领域更加重视发掘本民族固有的精神道德资源，因而使得历史上一度遭受压制的斯拉夫派思想、白银时代俄国思想家的思想，重新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俄国思想史上被打入冷宫的思想家的著作纷纷出版，加入到深入反思历史的思想战场中来。普京曾公开表示要人们寻求可作为俄国立国之本的俄罗斯思想体系。文艺学领域在深入研究民族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力求在吸收西方合理思想的过程中重建俄国文艺学的主体性。传统文学史的面貌随着侨民文学、地下文学的全面入场，其景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盘否定苏联的观点得到遏制，而开始客观地、历史地对待苏联的文化遗产。此前全面否定列宁、斯大林、十月革命的思潮也得到遏制。随着东正教神学思想的复苏，宗教文化的卷土重来，使人们意识到过去长期忽略了俄国文学的宗教哲学精神。宗教意识的复活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俄国经典文学的阐释路径，过去那种单纯的社会政治观点被扬弃，而改从宗教文化、宗教哲学角度阐释经典蔚为一时风尚。在这一大变局中，人们对经典作家作品的思想内涵有了新的、更贴合实际的认识，使其思想内涵得到深层开掘，从而与今天发生广泛的对话和互文。

近百年中俄国文化所走过的这一历史道路，不能不在整体上，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学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影响。中小学语文教学就其性质而言，也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的种种变化，是离不开它赖以生存的空气的。文化无孔不入地、无微不在地渗透到它的每个局部中来。因此，近百年俄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史，正是这样通过它的方方面面，从选用的教材、对教材文本的阐释、对阐释的再阐释及对阐释本身的更新等等，反映和折射着苏俄历史文化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的。

俄苏文学有其特点，和其他民族文化不同的一点是，俄国文学在俄国文化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历来就承担着反思民族精神、塑造民族灵魂的弥赛亚式的崇高使命和重任。中小学语文教学也不例外，承担着塑造俄罗斯人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角色，历来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强大的、深入贯穿了精神文化品性和人文精神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为俄国经典文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能够懂得美欣赏美的”传人。一个重视美文化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读者群体的支撑那是不可想像的。俄国人在世界各民族中，也历来享有重视文化的美称。俄国人即使在坐地铁公车上上班的路上也手不释卷，更是不可多得的美谈。俄罗斯在经济萧条时期其文学也不失其繁荣原因，即在于它拥有一个差不多是全球最多最有水平的欣赏者人群，而他们多数就是从中小学时期就养成了读书的爱好和兴趣的。俄国人即使是饿着肚子也要看戏听音乐，精神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比物质生活更重要更本质的生活。俄国人可以食无鱼但不能学无书。崇尚精神生活是最值得俄罗斯人骄傲的民族品性。前不久杨振宁在一次面对中国科学界的讲演中曾经说过：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曾对苏联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并能超过美国的原因做过一番调查，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汇集了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调查结果并不是俄国的科学技术有多么先进，而在于俄国人的人文精神教育普遍优于美国。因为人文精神教育能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的想像力和普世精神。这一点对于我们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

在俄国历史上，对于人文教育的作用问题，并不是没有反复和曲折的。19世纪和20世纪中，都曾有过对待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19世纪以实用主义实证主义为特征的平民知识分子皮萨列夫，就曾经掀起过一场“莎士比亚和皮鞋”究竟哪个更有用的争论。更有意思的是，就连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文学大师和巨擘，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甚至包括他那些享誉全球的三大名著，也站在实用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立场上予以全盘否认，更别说对莎士比亚了。列夫·托尔斯泰的《论艺术》，其中就渗透了这种思想，可惜国内学术界对此往往予以忽略。苏联时期，也曾产生过“物理学家和文学家”谁更“有用”的

争论,可见,即使在俄国这样重视人文精神教育的国度,对人文精神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也是不平衡的。20世纪苏俄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这一课题,势必难以忽略这些争论对中小学语文教学实际进程和演化过程的正反面影响。

文艺学对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影响是很复杂的,是多方面的,因为文艺学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学科,是多种学科的综合体。文艺学首先是艺术哲学,在苏俄史上,列宁的艺术反映论无疑对中小学校对于经典作品的解读、作品与其创作环境、文学中如何处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有着直接的影响。例如对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驿站长》等经典作品的阐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如今就有很大差异。过去文学教科书里选《驿站长》主要着重其阶级斗争意识,这和当时庸俗社会学文论占据统治地位无疑有很大关系。如今,人们在对这样的经典进行阐释时,恐怕正如茨维塔耶娃所说的那样,更多着眼于小说的超阶级全人类的博爱精神(例如对《上尉的女儿》“暴风雨”一章中“兔皮袄”一节的阐释;而对《驿站长》则更多着眼于世事冷暖人情淡薄的描写)。在对果戈理的态度上,以前人们根据别林斯基的著名论断,强调果戈理艺术上的成功和政治上的退步(《死魂灵》第二部的失败)。如今,果戈理与斯拉夫派的思想渊源、果戈理的宗教哲学思想、果戈理对俄罗斯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思考、果戈理作品中的宗教哲学内涵等的揭示,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然不同于传统文学史的果戈理形象。经典重读就是在全新的意识观照下对经典进行重新阐释,从而在发展中发掘传统经典作品的强大的生命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研究20世纪苏俄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历史沿革过程,目的是为我国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为中小学语文教学如何贯彻人文主义精神、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借鉴。

此文为所承担课题“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王富仁领衔)子项目导言。

汉语“文化诗学”： 在俄罗斯传统与美国学派之间

——关于“文化诗学”术语及其多样化形态的思考

邱运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化诗学”术语和学派的廓清

文学理论界频繁地使用的“文化诗学”这个术语在汉语语境中，大致呈三个不同的意义取向：美国新历史主义学派、以巴赫金为代表的俄国诗学和汉语诗学语境下的使用。

美国新历史主义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历史主义学者斯蒂芬·格仁布莱特（Stephen Greenblatt）的界定。1987年，美国“文化诗学”的首席代表格仁布莱特发表了《通向一种文化诗学》（Towards a Poetics of culture），他写道：文化诗学“是一种实践活动。”他感兴趣的是“需要有一些新的术语，用以描述诸如官方文件、私人文件、报章剪辑之类的材料如何由一种话语领域转移到另一种话语领域而成为审美财产。”^①而在更早的1980年，在《文艺复兴自我塑型》中，格氏认为“文化诗学”的“中心考虑是防止自己永远在封闭的话语之间往来，或者防止自己断然阻绝艺术作品、作家与读者生活之间的联系。毫无疑问，我仍然关心着作为一种人类特殊活动的艺术再现问题的复杂性。”作为文学批评家，其阐释的任务是，“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②1988年，在《莎士比亚的商

① 斯蒂芬·格仁布莱特：《通向一种文化诗学》，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② 斯蒂芬·格仁布莱特：《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讨》一书中，格氏将文化诗学界定为“对集体生产的不同文化实践之研究和对各种文化实践之间关系之探究。”具体而言，就是“追问集体信念和经验如何形成，如何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它种媒介，如何凝聚于可操作的审美形式以供人消费。我们可以考察被视为艺术形式的文化实践与其他相近的表达形式之间的边界是如何标示出来的。我们可以设法确定这些被特别划分出来的领域是如何被权利赋予，进而或提供乐趣、或激发兴趣、或产生焦虑的。”^①

19世纪至20世纪俄罗斯诗学。在俄国学者米·巴赫金（М. Бахтин）使用的意义上，即把文学置于整个文化格局上，尤其是在民间文化的背景上来考虑，如程正民先生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问题，这是文化诗学；从民间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问题，这是巴赫金文化诗学的特征，也是俄罗斯文化诗学的重要特征。”^②巴赫金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一文里这样说：“文艺学应与文化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了那个时代整个文化的完整语境，是无法理解的。不应该把文学同其余的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应像通常所做的那样，越过文化把文学直接与社会经济因素联系起来。这些因素作用于整个文化，只是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作用于文学。”^③在巴赫金的论述中，涉及到了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是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文化诗学定义的基础；二是作为文学研究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中介的文化地位问题，这是恩格斯一个思想的发展和继承。^④据程正民先生总结，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术语蕴涵着“哲学层面、文化层面和文艺学层面的理论意义和理论价值”。体现在哲学层面，“巴赫金认为民间的狂欢化文化、民间的诙谐文化体现了‘几千年来全体民众的一种伟大的世界感受’，这种感受为更替演变而欢呼，反对循规蹈矩的官腔，反对把生活现状和社会制度绝对对立起来”。“从文化层面来看，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提倡一种多元和互动的文化观。”“从文艺学层面看，巴赫金认为民间文化、狂欢化文化对文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⑤实际上，这个意义上的“文化诗学”概念既体现了一种思想风貌，又显示了一种根植于民族文学观念的深厚传统。吴晓都也说：“巴赫金的文本理

① 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p. 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② 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③ 见《巴赫金全集》中文版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页。

④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00页。

⑤ 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